

现代性与中国农村家庭幸福

刘红旭^{1,2}

(1. 西藏民族学院 法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2.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现代性是兴起于欧洲大陆的一种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 藉由殖民扩张在全球生根发芽。以现代性扩散下的中国农村变化为背景, 从幸福的意义出发, 我们主张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看待幸福的动态嬗变过程, 注意到幸福的流变是人们心性的折射, 更是中国农民对于社会变迁的认知和体验, 从而构成探索社会学研究农村幸福观的一种路径。

关键词: 现代性; 中国农村家庭; 幸福

中图分类号: C913.11; D4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082 (2012) 02-0114-05

一、现代性与中国农村

美国著名社会理论家乔治·瑞泽尔在《社会的麦当劳化》中刻画了现代社会一个成功的典型——依靠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发家的麦当劳, 以及正在任由麦当劳模式弥漫的世界。^[1]现代性孕育了社会学, 现代性扩张的进程伴随着社会学的成长。虽则有人声称我们从未现代过,^[2]有人认为现代性还是一项未尽的工程,^[3]但已有很多人早有预谋, 意图迈向后现代性作为表征的全新时代。^[4]实际上, 如果我们把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论证放置于历史长河, 可以发现概念本身蕴含的意义要远远胜于力求类型化的愿望。诚然, 正如 1848 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现代社会超乎想象的生产能力, 覆盖了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 现代性显现的生命力足以使其成为一个褒义的词汇, 然而并未停息的社会是否也会在某一个时点, 把现代性引以为豪的所有成果打包抛入历史的故纸堆, 以同样的姿态重新界定属于全新时代的现代性?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都只是人类历史轨迹上两个普通的节点。然而, 我们只有梳理社会学现代性的特征, 才能藉此视域把握传统与现代斡旋的农村场域里, 行动者主体如何经营宏观场景突变中的日常生活。

马克思·韦伯相信, 现代性是一个“祛魅”的世俗化、理智化和理性化过程, 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均遵循理性化的法则。^[5]涂尔干在研究现代性社会分工的时候认为, 各种混乱的社会分工是因为规范和制度的不完。^[6]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即意味着整个现代文明或工业社会,^[7]还认为现代社会是立存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8]哈贝马斯试图用沟通理性为工具理性辩护, 进而维护理性对现代性的基础性作用。^[9]安德鲁·芬伯格认为, 现代性指的是摧毁我们的记忆、文化和传统的一次理性主义的普遍发展史, 技术

收稿日期: 2012-03-20

基金项目: 西藏民族学院青年项目 (10MYQ15)

作者简介: 刘红旭 (1982-), 男, 甘肃岷县人, 西藏民族学院法学院讲师,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博士生。

文化主宰着时代的变迁。^[10]理性主义导向的制度设计、资本积聚和规范生成，构成了当下语境中现代性最重要的维度。不断成型的民族国家权力渗透，全球扩张的资本市场代表的现代性，文化谱系传演的父权制，集体记忆延伸的村落文化圈象征的传统性，在中国农村遭遇并都成为中国农村宏大叙事或明或暗的主体，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农村最重要的话语构成。

集体化时代随处可见的权力，非集体化时代挟裹在商品里的资本，联手塑造着中国农村现状，熟人社会里维系公共领域与私人家庭的父权险遇消解又获得新生。中国农村尽管不乏地域和习俗的差异，却更是一个权力与文化整合而成的系统。而当“我们把一个社会系统结构中的变迁定义为它的常规文化的变迁。如果我们考察最高层面的话，它是同总体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变迁相关的。”^[11]吉登斯意义上的现代性指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之后不同程度影响世界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实际上现代性更加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12]中国农村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样态，又受制于现代性符码无所不包的影响，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人生哲学都发生了位移。

现代性横扫中国农村，经济形态由集体化向非集体化过度，政治形态由人民公社向村民自治转变，文化形态由乡土文化为多元文化让步，社会形态由内聚统一向支离破碎演化。总体而言，现代性触角深入中国农村的时段，也是中国农村悲喜交加的时段，一面是丰裕的物质产品和骤增的世界身影，一面是销蚀的文化根基和断裂的村落社会。舍勒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精神结构遭遇现代性改造的论述，兴许可以为中国农村茫然的现状之后拔根的心性做一个注脚。

二、幸福的含义

幸福是人们对当下生活的心理感受，也反映出人们寄希望于实现的生活形式，幸福的讨论因而源远流长。《尚书·洪范》规范了中国文化行为的次序，其中的五福六极可以看作对于幸福的看法：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这样一种综合的幸福观影响了中国各个学派，渗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脉络内层。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守礼而行，墨家兼爱的思想里亦隐含着关于幸福的言说。知足常乐著称的道教“强调幸福不在于占有多少物质财富，拥有多少权力名声，而在于能够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地活着，且长生不死，故倡导福莫大于生”。^[13]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浪漫的时段，追求自然生态的玄学家则以人性本态为追求鹄的，王弼“圣人达自然之情，畅万物之情”^[14]的主张即是一斑。形成鲜明对照，陷于内外交困的晚晴时期学人远离了飘渺的幸福，转而关注时下的现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幸福的多重向度不同，当代人的幸福更加贴近现实，可由《辞海》的幸福定义“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得以佐证。

快乐即幸福和有德即幸福分别是古希腊罗马哲学晚期两大派别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伦理学的宗旨。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15]“幸福是自身就是善的东西。幸福就是人生的最终的目的”，“幸福是终极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目的”。^[16]康德则认为，“一个有德性的人还应该得到幸福，最理想的情况是所得的幸福和他所有的德性在程度上相一致。得不到报偿的德性虽然可贵，而伴随着应得的幸福的德性却最为理想。”^[17]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幸福论逐渐契合于国家福利，开始探究具备利维坦属性的巨大国家机器，能够为每一个公民提供什么的途径规避风险，获得幸福。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培根提出“全体福利说”，洛克提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幸福论，边沁、密尔提出了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主义，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提出追求满足个人情欲的利己主义或合理利己主义的幸福论，费尔巴哈在人的自然本质上建立了所谓“同志式的共同幸福”或“完全的合理

利己主义”的幸福论。^[18]

不同于哲学家思辨的幸福想象，社会学家希望对抽象的幸福概念操作化，制作幸福指标体系测量大众的幸福，从实证的角度得到诸如幸福指数、幸福感等可资对照的数据。受制于幸福本身的主观性和社会学测量的有限，加之社会对于政党文化宣传机制的不满，一项社会学对于农民幸福感的调查结果被斥为“伪社会学”。^[19]与此相反，徐安琪新进的一项研究有机结合了质性研究与量化分析，真实展现了中国人的家庭幸福观，“他们在表述自己的家庭幸福观时，不是千篇一律地在研究者事前所设计、所框定的项目中选择，而是以自己的经历、体验和朴实概括，描绘了2000多幅大小不同、形态各异、丰富多彩的家庭幸福观的生动图景。”^[20]循着这一路向，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农村家庭的幸福观研究，必须置于现代性的背景下，同时关注国家、资本、文化的形塑，也要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出发，在生活实践的逻辑中发现幸福的静态内涵与变动的认知体验过程。

三、嬗变中的中国农村家庭幸福

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开篇引入下岬村胡延军的四行诗句：家乃宙斯赋予之和谐整体/孕天伦之乐/乃幸福之源泉/温暖之象征，紧接着描述了多年担任村领导的胡延军组织了40多人家庭春节晚会。在作者看来，胡延军乐在其中的家庭幸福——家人之间互敬互爱的感情纽带，是胡延军及其众多乡亲实现幸福的地方。“胡延军家的故事包含了两重重要意义：一是家庭生活中个人幸福的重要性，二是每个个体本身的重要性”。^{[21] 3-5}天地君亲师的尊崇序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精神，生根于中国乡土社会，也只有在农村场域才能体察。也正是因为中国农村家庭幸福承载着家庭成员的幸福，家的运作才体现了中国农民对于幸福的追求，而且这是一个扩大的“神圣家庭”——现世的成员与故去的先辈都纳入其中。家庭为基元的生活样态，是传统中国国家政治与农村生活经历岁月互相构造的结果：基于自我主义形成“差序格局”的亲属关系，^[22]借助“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23]

如果简单以改革作为现代性冲击中国农村的风水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农村家庭的幸福依然是家庭的幸福。这一点体现在阎云翔东北农村的研究，也能在我们于西部农村的所见所闻中同样得到印证：农民延续至今的富裕象征首先是盖新房，每年春节期间分家的兄弟们不但要互相拜年，而且藉以大年初三祖坟扫墓团聚。而关于家庭幸福的内容，则有先物足再求精神的次序，正如年轻时曾在新疆支边的易中天在接受采访时所言，幸福是个大萝卜。中国农民悠久的靠天吃饭历史造就了脆弱的小农经济，能够让一家人吃饱穿暖，一度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幸福。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惯性，在我们访谈72岁的丁奶奶时，她对幸福的看法就是：家里人都吃饱肚子，有衣裳穿。尽管年龄在60岁左右村民会有更多关于幸福的内容，但是这些经历三年饥荒或只有饥饿记忆的人，都会自然而然把衣食住行的需要作为幸福的第一要务。即便是较为年轻的村民，从20多岁到50岁，都或多或少听说过老一辈讲述的挨饿故事，又经受了市场经济波动，也都会在幸福的度量衡上，优先考虑物质层面的丰足。

改革以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133.6元，1988年544.9元，1998年2662元，到2008年4761元。即使计入通胀，也会发现30年时间来一路攀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考虑到税费改革对农民负担的减轻，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农村家庭的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数，远远没有收入增长的速度和效果，并出现回落的情形。农村家庭的幸福认知中，关注家庭物资充裕的

《易中天：幸福是个大萝卜》（《都市女报》2010-08-20）：易中天年轻支边时物资极度匮乏，为了给怀孕的妻子增加营养，他想尽办法把普通的萝卜制作成美味佳肴，并以萝卜宴招待参加女儿周岁聚餐的乡亲。“生活避免不了苦难，却从来不拒绝将萝卜做成盛宴，这是对生活的尊重，还是一种信念：美好就在身边，就在你手中”。

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网站统计数据栏目：<http://www.stats.gov.cn/tjsj/nds/>。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的变化中得到印证，据李培林和李炜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研究表明，2006年数据反映出农民工在收入水平较低、劳动强度较高的情况下，却保持着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2008年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就业和生活压力加大的影响下，其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和未来预期却都有所降低。参见李培林、李炜《近年来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10(1):119-131。

底线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不再单纯做自我的纵向比较，而是横向比较他者的幸福。既然幸福是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是一种人们社会态度的外显，我们就不得不反身向外，探究社会环境的变迁对于农村家庭幸福的影响。

首先，超然的国家与无处不在的权力影响着农村家庭的幸福。虽然目前关于中国传统社会认识范式有“国权不下县”和“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争论。^[24]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建构，延伸至乡镇的基层政权及其附属的村政共同促成国家对乡村的空前渗透，尤其是集体化时代政治动员对于家庭神圣性与权威性完全的瓦解，造成“在国家干预减少之后，国家原来开拓的社会空间并不一定只是由传统的价值观来填补。相反，新型的市场经济、消费主义以及激进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影响等种种因素，都会与传统观念争夺空间”。^{[21][25]}时至今日，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村庄支离破碎的文化氛围，都与国家全面进入乡村“打破旧世界”，又彻底撤离却未建设“新世界”，有着不可回避的联系。没有舆论压力和传统威权的村庄，拒绝养老的发生率不断增长，三代同堂的家庭幸福成了难以奢求的旧梦。

其次，市场化无孔不入的能量打碎了农村家庭自给自足的幸福。没有任何人有权在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时候，想象农村永远是一幅逍遥的田园风景，默默为城市人提供安全的食品和度假的场所，而农村只是日复一日重复着千年以来的循环。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下，无数单个的农村家庭已经被卷入由质量和成本决定产品竞争能力的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囿于巨大的人口压力和有限的耕地面积而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加之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大多数地方缺水且水利设施不健全，这一限制性的生产结构严重制约了农产品的市场化。无论是源于城市巨大的吸引，让农家子弟一次次萌发出走城市的冲动，还是日渐贫瘠的土地，再也无力繁育青春的梦想，中国农村成为一个掏空的废墟。资本占有了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资本生产了附加值极高的低品质产品销往农村，资本交易的媒介货币偷换了村民交往的互惠期待，让中国农村守望相助、患难相恤、有无相通的“乡情”充斥着铜臭。金钱为核心的幸福观，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弥散。

最后，文化殖民主义者所向披靡的思潮摧毁了中国农村固守的伦理幸福。传统社会中农耕文明基石之上形成的儒家“三纲六纪”的伦理思想统领着中国人思想，维持和强化着熟人社会稳定的秩序。但是，随着上世纪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封闭已久的国门，东西方文化传统剧烈激荡，早已在国人平静的心中荡起层层涟漪。在长达近百年的历程中，虽则不时有意识形态的侵入，但总是难以抵挡改革开放后更加强健的西方文化之风，而这些从根本上导致了农村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全面渗透之下变得残缺不全，四分五裂。^[25]传统价值遭遇肢解，现代价值尚在孕育，文化自我殖民化通过媒体和符号暴力不断消解襁褓中的新型民族文化，中国农村家庭的结构、话语都在经受拷打。

四、小结

舍勒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还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26]中国农民的幸福是叠加在家庭幸福之中的，人们心态的转变是根本性的问题。社会发展的轨迹，曾有偏离人性疯长的教训，但毕竟要回归于人本。幸福永远存在，现代性只是倏忽一瞬。国家、资本和文化的因素构成了现代性主要的维度，中国农村家庭的幸福勾连于农民的主观体验。社会学笔下的现代性意味着反思性，不同行动者流动的幸福，本身即是鲜活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乔治·里茨尔. 1999. 社会的麦当劳化[M]. 顾建光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16.

[2]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

[3] Habermas. 1980.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J]. from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363.

- [4] 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26-27.
- [5]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简惠美,康乐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
- [6]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
- [7]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2.
- [8] 安东尼·吉登斯.1998.民族—国家、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5.
- [9]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
- [10] 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
- [11] W.茨阿波夫.社会变迁[M]//苏国勋,刘小枫.社会理论的诸理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77.
- [12]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9.
- [13] 孙亦平.论道教幸福观的特点及现代意义[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72-78.
- [14] 王弼.王弼集校释(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87.
- [1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
- [16]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6.
- [17]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2.
- [18] 张静.中西幸福观之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2008(3):64-68.
- [19] 张柠.伪社会学和农民的幸福感 [N].南方都市报,2004-12-28.
- [20] 徐安琪.家庭幸福:金钱愈加重要了吗[J].社会科学研究,2011(1):95-103.
- [21]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M].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 [22]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30.
- [2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7:80.
- [24] 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220.
- [25] 刘红旭.链合:庙会组织中的村庄精英角色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9:34.
- [26]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M].刘小枫编.罗梯伦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182.

(责任编辑 陈 瑜)

Modernity and China's Rural Family Happiness

LIU Hong-xu^{1,2}

(1.School of Law , Tibet Institutions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712082,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Modernity was raised in European continent, as a social life and organization model, which was rooted by colonial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changes of village in China and its background of modernity, from the meaning of happiness,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happiness should be attached via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 Happiness transformation refers to change of people's nature, reflects China farmers' cognizance and experience through social change, thus constitutes a path to rural happiness research in sociology.

Key words: modernity ;China's rural family; happiness